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历程、取向及走向

朱　浒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摘　要: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灾害史研究,约萌发于百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灾害史研究才得到长足发展。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自然演变取向成为灾害史研究的主流。改革开放以后,大批历史学者加入灾害史研究的行列,社会变迁取向逐步成为该领域的另一个重要方向。在这两个取向指引下取得的大量成果,构成了中国灾害史研究的主干。要推动中国灾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需要以建设综合性灾害历史数据库为纽带,强力深化自然科学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合作;另一方面,尤其是历史学者需要强化问题意识、运用新史学方法,努力克服灾害史研究中的"非人文化"倾向。

关键词: 中国灾害史;研究取向;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 K 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8)06-0120-11

中国灾害史研究是指对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及其关联内容所展开的研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与自然灾害如影随形。经济史家傅筑夫曾言,一部二十四史,"几无异一部灾荒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灾害史研究很少为人所了解。直到 21 世纪初,有人还在《读书》杂志上感叹:"关于灾荒研究方面的著作却少得可怜。"① 事实上,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灾害史研究的萌生,至今已将近百年。遗憾的是,学界以往就对灾害史研究长期缺乏系统把握,也就难以展现该领域的完整面貌。

灾害史研究是一个覆盖面极其广泛的学术领域,其包含的内容兼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部类。就自然科学而言,许多学科中都存在着大量以历史上自然灾害为主体内容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大都有着较强的专业性,所以一般不易为大众乃至许多史学工作者所知。在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灾害史研究的主要阵地是历史学,而如何统筹把握相关内容也是长期令人困扰的问题,即便是在史学界内部,也出现了许多内涵不同的提法。概言之,鉴于灾害史研究领域长期高度分散的局面,无疑极大增加了进行整体性认知的难度。

新世纪以来,随着资源、环境等问题的加剧,灾害史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发展势头十分迅猛,但各种隐忧亦随之而来。同时,推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亦愈发迫切。这就意味着,亟需更为系统地总结灾害史研究,深入检视其发展历程、实践取向,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本文便是针对这项工作的尝试,以收抛砖引玉之效。另须说明的是,本文是以问题为中心,所以只能提及个人认为的代表性成果,其间挂一漏万之处,敬祈方家指正。至于欧美学界的中国灾害史研究,因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已有精当的总结②,此不赘述。

收稿日期: 2018－09－15

作者简介: 朱浒,男,浙江杭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准号:13&ZD092)阶段性成果。

① 包泉万:《承平日久 莫忘灾荒》,《读书》2001 年第 8 期。

② 艾志端:《海外晚清灾荒史研究》,杜涛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7 月 26 日。该文实际上涉及了关于整个清代灾害史研究的状况,而清代灾害史又是国外中国史学界研究最为集中的时段,所以基本代表了国外研究的一般状况。

一

中国有关文字记载的灾害历史可以上溯到三千年之前,其丰富性、连续性,世所罕有。约从《汉书》开始,中国又形成了有意识整理和归纳灾害历史记录的传统。当然,这一传统还不能视为对灾害史的研究。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灾害史研究,是随着现代科学体系在中国的确立而形成的。20 世纪 20 年代,在一场席卷华北五省的特大旱灾及海原大地震爆发后,诞生了第一批关于中国灾害史的研究性成果。这一现象绝非巧合,后来的事实表明,每次重大灾害发生后,中国都会出现一个灾害史研究较为繁荣的阶段。另外,在最早一批灾害史研究者中,既有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有自然科学工作者。因此可以说,现代灾害史研究在中国的萌发,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就目前所见,于树德于 1921 年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我国古代之农荒豫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是最早一篇关于中国灾害史的研究论文。① 于树德早年留学于日本,攻读经济学,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是国内早期合作化思想的传播者之一。作为一位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他在这篇论文中,初步梳理了我国备荒仓储体系的组织类型及历史沿革,并剖析了仓储的备荒功能及其利弊。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项重要灾害史研究成果,是 1926 年出版、马罗立(Walter Mallory)所著《饥荒的中国》。② 马罗立时为著名非政府救灾组织——华洋义赈会总事务所的秘书,他在书中运用现代科学知识,考察了灾害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并探讨了自然与社会两方面的致灾根源。而在自然科学领域,最早对灾害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当属竺可桢。1927 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一文,运用气象学理论和地理学知识,精当地分析了清代以来直隶地区频繁发生水灾的原因。③

1931 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水发生后,掀起了灾害史研究的一个小高潮。更多学术工作者步入这一研究领域,相关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较前大为提高。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成果数量大概占 1949 年前总数的四分之三,其研究内容也扩展到灾害计量、灾害与社会、救灾制度等许多方面。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称道的是王树林在 1932 年对清代灾害记录所做的定量统计工作。他从社会学统计的角度出发,首次对整个清代灾害的发生频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计量处理,所附统计表格共有 18 份之多。④ 另外一项令人瞩目的成果,也是对后来具有深远影响的成果,则是时为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学生的邓拓(时名邓云特)在 1937 年 6 月完成的《中国救荒史》一书。⑤ 该书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为指导,首次完整勾勒了中国上古至民国时期的灾情、历代救荒思想和政策的演变状况,是一部具有中国灾害通史性质的著作。该书的出现,既立足于此前灾害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又全面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视角,是民国年间灾害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其社会知名度至今不衰。

在《中国救荒史》面世后,中国进入了连续十多年的大规模战争时期,其间又伴之以 1939 年海河大水、1942 年中原大旱灾等大型灾害。在艰难时势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有依然坚守灾害史研究的学者。其中最有价值的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对灾害史资料的系统整理,其代表是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高佣于 1939 年完成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一书⑥;其二是对救灾问题的制度史梳理,其代表作是王龙

---

① 于树德:《我国古代之农荒预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东方杂志》第 18 卷第 14、15 期。

② Walter H. Mallory, *China: the Land of Famin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26. 该书于 1929 年便有了中文译本(吴鹏飞译,上海:民智书局 1929 年版)。

③ 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科学》第 12 卷第 12 期,1927 年。

④ 王树林:《清代灾荒:一个统计的研究》,《社会学界》第 6 期,1932 年。

⑤ 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

⑥ 陈高佣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上海书店 1986 年影印版。

章的《中国历代灾况与振济政策》和于佑虞的《中国仓储制度考》,前者较《中国救荒史》更为系统地总结了民国时期救灾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后者则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中国备荒仓储机制的演变状况及其利弊①;其三是来自自然科学界的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是气象学家谢义炳以及涂长望、张汉松等人,分别对明清时期水旱灾害的发生周期进行了探索。② 虽然这段时期灾害史研究的势头远不如上一个阶段,但已属难能可贵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灾害史研究走上了新的发展征程。不过,直到改革开放前,灾害史研究总体上几乎是向自然科学部类“一边倒”,也就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主导了最主要的研究进展。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该时期开展灾害史研究有着很强的现实需求和导向,那就是优先要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事业、创建社会安全保障机制服务。特别是为了解决工矿企业和城市建设的选址、农田水利建设以及生命健康等问题而开展的历史回溯,更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大显身手的地方。与此对应,这一时期的成果大都集中出现在自然科学类期刊上。相较而言,人文社会科学在这一领域的工作,远远无法与自然科学比肩。除了协助自然科学工作者完成资料整理等辅助性工作外,这一时期史学工作者基本没有推出过具有较大影响的灾害史成果。这时期港台地区的历史学者曾推出过一些较有价值的相关成果,但在当时条件下,也很少为大陆学界所知。

无疑,历史学者在灾害史研究中的缺席是十分不正常的现象。正如夏明方概括的那样,自然科学主导下的灾害史研究,“对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些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往往语焉不详”,甚至“隐约还存在着一种摆脱社会科学而昂然独进的意向”,由此导致灾害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着“非人文化”倾向。③ 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学亟需摆脱教条化框架的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研究领域,灾害史研究遂悄然回归史学视野。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李文海痛感“史学危机”的说法,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带动了一批同事和学生从事灾害史研究,成为灾害史研究的重要阵地。此后,史学工作者在这一领域的成果也逐渐引起学界和社会的注意。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为始,随着环境恶化、资源紧张、人口压力等问题在中国受关注的程度急剧增加,灾害也成为社会热点问题。特别是 1991、1998 年长江领域特大洪水,2003 年“非典”、2008 年汶川地震等重大灾害事件的刺激下,灾害史研究的成果日益增多,队伍亦不断壮大。据统计,在 2000 年以前,以灾害史为主体内容的研究成果,专著约为 5 部,论文约 150 篇。而自 2001 年至今,相关专著总数已在 20 部以上,论文则几乎每年都超过 100 篇,并且还不包括相当可观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2004 年,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成立,中国灾害史学界首次拥有了独立的学术组织。自此之后,以灾害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年均至少 1 次。因此,说灾害史研究当下正在方兴未艾,绝非夸大其辞。

21 世纪以来的灾害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首先,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该领域覆盖的范围得到极大扩展。曾几何时,灾害史研究者寥若晨星。而到如今,国内外学界都能看到不断加入灾害史阵营的新成员。此外,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加,灾害史研究涉及的时空范围亦空前广阔。就时段而言,上起先秦、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都出现了专门研究。就空间而言,灾害史研究也对当今中国所有行政区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此外,在区域社会史影响下,很多研究者更是从地方视角和微观层面来考察灾害问题,从而使灾害的历史面相更加细化。

另一个重要成绩,是灾害史资料得到了大规模的整理和出版。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学界所能利用的资料较为有限。那些主要从自然科学

① 王龙章:《中国历代灾况与振济政策》,重庆:独立出版社 1942 年版;于佑虞:《中国仓储制度考》,南京:正中书局 1948 年版。

② 谢义炳:《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气象学报》第 17 卷第 1—4 期合刊,1943 年。涂长望、张汉松:《明代(1370—1642)水旱灾周期的初步探讨》,《气象学报》第 18 卷第 1—4 期合刊,1944 年。

③ 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 年第 3 期。

的角度出发而编纂的资料,集中反映的是灾害本身的情况,社会内容基本缺失。只有李文海牵头编写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其《续编》,成为史学界较多依靠的资料。① 进入 21 世纪后,资料整理工作得到了显著加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中国荒政书集成》的出版②和《清代灾赈档案史料汇编》的整理。前者大体收录了自宋代至清末出现的所有重要救荒文献,后者则是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灾赈档案的首次全面整理。在这股潮流中,还有一些汇集了方志或历代官书中灾害资料的大型文献汇编,也都纷纷面世。

不过,上述成绩更多体现了灾害史研究在"量"上的进展,而在"质"的方面,即问题意识、研究视角、观点和水平等方面,其得失尚未得到充分梳理。以往对灾害史研究状况的诸多综述,大多是对研究成果的分类和概括,很少对研究取向及研究水平做出明确判断。更何况,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自开展的灾害史研究,有着差别很大的研究框架、理念和方法,也大大增加了综合判断该领域学术进展的难度。然而,现下对灾害史研究的整体认识和把握又更为紧迫。这是因为,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到前人研究的长处与不足,就很难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也很难迅速提高灾害史领域的学术水平。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梳理一下该领域在研究取向上包含的不同路径及其价值,以期对探索灾害史研究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有所裨益。

二

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灾害史研究一度主要是由自然科学工作者主导和开展的。一方面基于现实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又得到许多著名科学家的重视,自然科学领域的灾害史研究很快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研究路数,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体上,这种路数可以概括为灾害史研究的自然演变取向,也就是以探讨历史上灾害的自然属性、发生规律等问题为主要内容,以现实应用为基本导向。尽管迄今为止,自然科学内部涉足灾害史研究的学者来自诸多差异很大的学科,这种基本取向却得到了较为普遍的遵循。而且,无论是在资料整理上还是在研究实践上,自然科学工作者都对这一取向贯彻得相当彻底。

显著体现这种自然演变取向的首个例证,来自于中国地震史研究领域。1954 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四光,根据参加中国经济建设的苏联专家的要求,倡议整理编辑中国地震历史资料,为选择厂矿地址提供参考。经地震工作委员会讨论通过,决定委托历史学家范文澜、金毓黼主持此事。③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一些高校的支持下,从八千多种历史文献中,获取了从公元前 12 世纪至 1955 年的地震记录,编成《中国地震资料年表》。④ 而最早大力利用这一资料的则是地震学家李善邦。他依据年表资料编制了全国历史地震烈度统计图和全国地震区域划分图,初步满足了工业建设地点选择和工程抗震级别确定的要求。此后,他又主持编写了《中国地震目录》第一、二集,初步揭示了远古以来我国历史地震演变发生的规律,以及地震危险区空间分布的基本轮廓,被誉为是"用科学方法整理史料"的一项工作。⑤

在 1976 年唐山大地震的刺激下,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地震局又联合组成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组织历史工作者和地

①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

③ 黎澍:《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序言》,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总编室编:《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④ 《编辑"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说明》,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编辑:《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⑤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0 页。

震工作者对地震史料再作一次广泛的搜集,委托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谢毓寿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蔡美彪主持编纂,对原有地震年表进行了全面扩充,其成果是 5 卷本《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虽然该书编者在前言中称:"本书所收历史文献资料,均保持原貌,依据年月顺序编排,不作地震学的分析和综合,以便研究者可以直接利用原始资料,依据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判断。"①其实,该书的编辑主要还是遵循地震学界的思路,把重点放在挖掘震情记述、地震前兆等内容上。而对这些地震史料最具深度的利用,还是地震学界据此进行的历史地震的震级估定、等震线图绘制以及震中位置等问题。尽管新世纪以来不少历史学者也加入了地震史研究的行列,仍无法撼动地震学者在地震史领域的主导地位。

另一个突出反映自然演变取向的例证,出现在气象史研究之中。并且,在这一领域,自然科学工作者更少依靠与历史学者的合作。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兴办农田水利,亟需深入了解和分析各地区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其规律,国内由此出现了整理旱涝灾害历史记载的高潮。中国科学院的徐近之是这一潮流的代表人物,他大力整理中国历史气候资料,由此探讨历史上温度、雨量的波动,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② 从 1956 到 1958 年,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组织大批力量,从清代档案奏折中搜集全国范围内从 1736—1911 年有关水利的史料。③ 这批洪涝档案史料的整理成果,除了支持气象灾害研究外,还对水利史研究具有珍贵价值,故而从 1981 年起,又按照全国七大江河流域的分野分别加以整理,以《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为名陆续出版。

与此同时,各地气象局、文史馆、水利局或农科院,也纷纷开展这类旱涝灾害历史记载的整理工作。1977 年,中央气象局研究所(现为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与南京大学气象学系等十几个单位协作,编成《全国近五百年旱涝等级资料》和《全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各一卷。1978 年中国气象学会年会的总结中宣称:"我们气候工作者根据……整理出自 1470 年以来的旱涝资料,评定了全国 118 个代表站 1470—1977 年逐年旱涝等级。……讨论了十五世纪以来我国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对近五百年来我国气候变化的大致轮廓有了初步认识。"④而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对气候历史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的汇总和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便是至今仍被广泛利用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⑤

此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张丕远又组织力量对地方志中的气候信息再次进行整理,且除旱涝之外,还整理了诸如饥馑、霜灾、雪灾、雹灾、冻害、蝗灾、海啸和瘟疫等项目的灾情状况,内容愈加丰富。⑥ 中央气象局张德二主编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是迄今最详实、最丰富的中国气候史资料集,系统编列了三千多年间全国各地天气、气候、各种气象灾害的范围、危害程度,以及与气象条件有关的物候、农业丰歉、病虫害及疫病等记述,采用地方志达 7713 种。⑦ 气象学家张家诚称,该书的出版是"中国历史气候学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⑧ 在大批新气候史料得

---

① 《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编辑例言》,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总编室编:《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纪念徐近之先生逝世四周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集刊》编辑部编:《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集刊》(第 3 号),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③ 《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前言》,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④ 徐近之:《历史气候学在中国》,《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集刊》编辑部编:《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集刊》(第 3 号),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⑤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 1981 年版。

⑥ 夏明方:《大数据与生态史: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清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⑦ 张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⑧ 张家诚:《历史气候学趋向成熟的标志——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科学通报》2005 年第 5 期。

到整理的基础上,气象灾害史研究也步入了新的研究阶段,修正、弥补了以往研究的许多缺陷和短板,满志敏、葛全胜等人的研究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①

第三个充分展示自然演变取向的例证,应属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灾害史研究基础上提出将“灾害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独立学科的构想。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一批自然科学工作者即力图开展跨学科合作,深入认识各种天文和地球现象之间的复杂联系。在这种天文、地球、生命有机结合的思想认识指导下,中国地震局高建国较早地阐述了开展“灾害学”研究的构想。他认为,灾害学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其目的是为了预报,但是,“抗御未来自然灾害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尽量了解自然灾害的历史,以掌握自然界变化的规律”。而中国基于文献记录的长期传统,开展灾害学研究又有着十分特殊的优势。② 在具体研究中对这种灾害学思路的贯彻,以宋正海、高建国等人开展的“中国古代自然灾异整体性研究”工作最为显著。1992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包括 251 个年表,是首部大型综合性中国古代自然史工具书。③ 在此基础上,宋正海等人又进一步综合、推进了关于中国古代自然灾(害)异(常)群发期的基础理论。该理论认为,“自然灾害或异常的发生不是均匀的,而是起伏的,明显集中于少数几个时期”。中国历史上可以明显辨识出来的基本自然灾异群发期,主要有夏禹洪水期、两汉宇宙期、明清宇宙期三个时期。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这种群发期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界复杂的内在联系和变动的整体性”,“不仅有利于对历史上某些重大社会变动、文化事件、科技成就的出现作出更为科学的解释,也有利于当代全球性变化研究、自然灾害的中长期预报和国民经济远景规划的自然背景预测”。④这类研究也表明,从自然科学出发的灾害史研究也意识到需要超越自然史领域,进一步去解释人类社会的变迁。

三

实际上,从灾害现象来透视相关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正是灾害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取向。这种社会变迁取向的主体思路,是以历史上灾害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应对问题为重心,通过揭示灾害与政治、制度、经济和社会诸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认知相关时期社会变迁的具体进程及其脉络。简单说来,社会变迁取向的灾害史研究更侧重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反应,而自然演变取向的灾害史研究更关注自然界在人类面前的变动。这种社会变迁取向,在民国时期于树德和邓拓等人的研究中已有明确显现,其后来的发展却长期逊色于自然演变取向。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变迁取向才得到了长足发展。

如前所述,历史学界大力开展灾害史研究,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也以历史学者为主力军,加上来自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学者,乃至部分自然科学学科的学者,共同形成了社会变迁取向的灾害史研究队伍。随着这支研究队伍的壮大,社会变迁取向的灾害史研究日益成为一股学术潮流,从而大大丰富了灾害史研究的内容。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社会变迁取向为指导的灾害史研究成果,呈现出越来越繁盛的发展势头,与自然演变取向一起,有力推进了灾害史研究。对于这种发展态势,从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路径出发所展开的灾害史研究,提供了最显著的证明。

以政治史为路径的灾害史研究,其主旨是通过分析灾害与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关联与相互影

① 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 高建国:《灾害学概说》《灾害学概说(续)》,《农业考古》1986 年第 1、2 期。

③ 宋正海总主编:《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④ 宋正海、高建国、孙关龙、张秉伦:《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群发期》,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序”。另外,高建国曾认为,在这三个群发期之外,还有第四个群发期即“清末宇宙期”(约 1870—1911 年)。(《灾害学概说(续)》,《农业考古》1986 年第 2 期)

响,将灾害作为一把钥匙,来理解和把握相关历史时期国家能力和制度建设的成效。邓拓的《中国救荒史》已展示了这一路径的基本框架,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大陆学界长期缺乏跟进。港台地区的个别学者则较早地运用了这一路径。1960 年,台湾学者王德毅系统考察了宋代荒政体制,高度评价了宋代“自上而下的救荒热忱”和“详明而切实的备荒措施”,以此“说明宋代立国的精神”。① 台湾学者何汉威于1980 年推出的关于晚清“丁戊奇荒”的著作,则是另一项重要的灾害政治史研究。作者详尽论述了灾荒期间清政府的救灾活动,认为此次大灾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清廷及灾区当局限于财力的短绌、行政效率的低下,使得赈灾成效不大。② 由此可见,清朝在灾荒中的国家能力是其关心的重点。

在中国大陆学界,灾害政治史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较早意识到这一路径重要性的学者是李文海,他指出,灾荒问题“是研究社会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来”。③ 他一再强调,要注意自然灾害“给予我国近代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同时,近代经济、政治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使得这一时期的灾荒带有自己时代的特色”。④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率先进行了将灾害引入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一系列尝试。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 1991 年发表的《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一文。该文展示了如何以灾荒问题为视窗、又如何将灾荒作为重要变量来审视重大历史事件,同时又避免给人以“灾害决定论”的偏激印象。⑤

相对而言,灾害政治史研究的学术积累堪称丰厚。在 20 世纪 90 年代面世的灾害史著作中,绝大部分都属于政治史路径。除了李文海及其研究团队推出的几部著作外,较为重要的专著还有张水良的《中国灾荒史,1927—1937》,该书通过分析十年内战期间中国灾荒的实况、成因和影响,着重论述了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对于灾荒的不同应对。⑥ 另外还有李向军的《清代荒政研究》一书,该书较为全面地描述了鸦片战争前的清代荒政体制及其成效,认为清代荒政集历代之大成,是维持社会再生产、保持国家稳定的一项基本国策。⑦ 进入 21 世纪后,断代性的灾害政治史研究得到更多的应用,秦汉以降几乎历朝历代荒政问题都得到了深度不等的研究。

灾害经济史研究的主旨,是着眼于灾害打击下的经济现象及活动,以及灾害应对的经济基础等内容,据此来判断相关时期国家经济结构的性质、特点及能力等问题。这方面的开拓之作,是王方中《1931 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一文。该文详实论述了水灾造成的多项重大经济损失,有力证明了此次大水灾是促成 30 年代国民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⑧ 夏明方的《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是第一部对民国时期灾害经济史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该书以灾害为切入点,通过对民国时期乡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诸要素的深入辨析,清楚解释了以往近代经济史学界所认为的许多悖论现象,重新分析了民国乡村的经济结构及其秩序的特性,也充分展示了民国社会脆弱性的经济基础。⑨

清代灾害经济史也是学界关注较早、成果较为丰富的一个方向。清代前期的研究重点是自然灾害与农业经济的关联。如陈家其分析了明清时

① 王德毅:《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9、202 页。
② 何汉威:《光绪初年(1876—79)华北的大旱灾》,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9—110 页。
③ 李文海:《论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 年第 6 期。
④ 李文海:《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5 期。
⑤ 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 年第 5 期。
⑥ 张水良:《中国灾荒史,1927—1937》,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⑦ 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5 年版。
⑧ 王方中:《1931 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
⑨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期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自然灾害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巨大影响,认为这是粮食产量下降的主因之一。① 王业键等人考察了清前期气候变迁、自然灾害、粮食生产与粮价变动的关系,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粮价高峰大都出现在自然灾害多的年份。② 李伯重认为,19 世纪初期气候剧变引发了江南地区连续遭遇大水灾,极大恶化了农业生产条件,是导致中国经济出现"道光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③ 晚清时期的灾害经济史,主要集中在灾害与近代工业化的关系上。夏明方关于灾荒与洋务运动的系列研究表明,在清末灾害群发期的历史条件下,自然灾害对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④ 朱浒的系列研究则指出了灾害与近代工业化的另一个面相,即赈务关系所激发的社会资源,成为以洋务企业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在中国具体落实的重要途径。⑤

以社会史为路径的灾害史研究,是十余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研究路数亦相对较为多元的一个方向。大体上,这一方向的主旨可以归结为,通过探究灾害驱动下的社会行为和诱发灾害的社会因素,进而揭示深层社会结构、进程及社会权力格局的演变。就迄今为止的总体状况来看,灾害社会史领域中得到较多关注的向度有两个,其一是通过灾害场域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二是从灾害来勘察地域社会的变动机制及其脉络。

较早通过灾害场域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当属李文海对晚清时期义赈活动的研究。该研究率先指出,义赈的兴起与洋务运动之间有着密切关联,是一项新兴的社会事业。⑥ 沿着这个思路,朱浒进一步拓展了对义赈活动的研究,深入剖析了其发展动力、运作机制及社会影响,从更为广泛的视角论述了义赈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⑦ 在关于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的研究中,主导框架也是国家与社会。黄文德从国际合作的角度出发,认为该会的经验是近代中国非政府组织与国际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起源。⑧ 蔡勤禹认为,该会凸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间组织的角色、地位乃至市民社会成长的兴衰跌宕和"公"的领域的起伏变迁。⑨ 此外,余新忠关于清代江南瘟疫的研究,虽然以医疗社会史为视角,其问题意识仍是以探讨中国本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指归,并提出应以合作与互补来认知两者的互动。⑩

在另一个向度上,即从灾害来勘察地域社会的变动机制及其脉络,较早的实践者是王振忠,他通过考察明清时期福州社会对自然灾害的反应与对策、与灾害相关的民间信仰及乡里组织等问题,展现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进程的内在脉络。⑪ 进入 21 世纪后,这一思路得到更多运用。如苏新留探讨了民国时期河南乡村社会的灾害应对与灾害打击下的民生,展现了当

---

① 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91 年第 3 期。
② 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
③ 李伯重:《"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经济衰退、气候剧变及 19 世纪的危机在松江》,《社会科学》2007 年第 6 期。
④ 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一》,《清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二》,《清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
⑤ 朱浒:《从插曲到序曲:河间赈务与盛宣怀洋务事业初期的转危为安》,《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6 期;《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清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同治晚期直隶赈务与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历史研究》2017 年第 6 期。
⑥ 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清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
⑦ 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⑧ 黄文德:《非政府组织与国际合作在中国——华洋义赈会之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 2004 年版。
⑨ 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⑩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⑪ 王振忠:《近 600 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脆弱性。① 汪汉忠则从民国时期苏北地区灾害与社会的互动出发,探讨了当地特定社会经济结构导致现代化进程滞后的原因与机制。② 张崇旺以明清时期江淮地区自然灾害为主线,探讨了该地区社会经济长期落后的根源。③ 不难想见,随着研究资料的进一步开拓,这一向度的研究必然还会愈加丰富。

四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界主导下的自然演变取向,和以历史学界为主力军的社会变迁取向,构成了中国灾害史研究的主体框架。除了前面提及的成果,另外还有许多限于篇幅无法提及的高质量专著和论文,保证了中国灾害史研究在学术界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毋庸讳言,灾害史研究在迅猛发展的同时,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也在潜滋蔓长,并且在有些方面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目前灾害史研究中最为明显的一大缺陷,当属跑马圈地式的粗放性研究。这方面的具体表现是,尽管许多成果的研究对象是不同时空范围内的灾害,其研究思路和框架却是千人一面。大体上,这类研究大都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某地域空间或某时段中灾害的发生状况,其二是灾害对某时某地造成的各种影响,其三则是国家与社会的各种灾害应对。除了所述时空范围的区别外,这类研究最终形成的看法往往雷同。例如,凡谈及灾情特点必称其严重性,述及灾害影响便称其破坏性,论及救灾效果必称其局限性。至于某一地域、某一时段内灾害与社会关系的特定表现及其属性,则全然缺乏提炼。可以说,这类研究表面上似乎要综合自然演变取向和社会变迁取向,实则属于缺乏深度的大拼盘。

第二个较大的缺陷,是学界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借鉴、融合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具体而言,主要应该大力避免两种极端情况。其一是不少研究者很少了解自然科学界的灾害史研究,在讨论灾害成因时,往往陷入“天灾就是人祸、人祸导致天灾”的循环论式的说法而不能自拔,对于自然演变对社会结构的长时段影响缺乏足够认识。其二则是夸大自然因素的作用,脱离自然科学的学科情境,将某些特定情况放大到“灾害决定论”的程度。例如,灾害灭亡了某一王朝或国家、“明清小冰期”造成的气象灾害打断了社会正常发展进程等说法,皆属此列。事实上,自然科学界的不少重要灾害史成果,其数据和信息并不完全准确,再以之为基础来判断灾害的演变规律及其影响,也就难以可靠。

第三个较为明显的不足,是在研究视野上往往出现失之片面的情况。特别是在一些研究成果数量较多的领域,这种情况更为明显。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关于备荒仓储的研究。早先对于备荒仓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政府政策和制度建设的梳理,而忽视实践层面的具体展开。近二十多年来,备荒仓储的风向又主要转向了区域社会史角度。而这一角度的研究在观察备荒仓储结构形态的转变时,往往将之认定为国家权力的衰微、基层社会控制权的下移的证据。其实,这是在缺乏对国家视角的充分把握下做出的片面判断。已有学者指出,要理解备荒仓储的结构性变动,决不能将国家视角置于次要的位置。④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近代中国两个最大的救灾组织即华洋义赈会和红十字会的研究。既有研究基本都是在现代化范式的指引下而展开的,而长期忽视了也非常重要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向度。这两个组织虽然有十分强烈的西方化色彩,但要解释它们被中国社会的接受过程和扎根途径,就必须探究本土化向度;要理解西方对华赈灾力量的具体组成,以及中国本土实践对于国际合作救济事业的影响等问题,就必须更多关注国际化向度。因此,仅以现代化范式为指归还是过于狭隘了。

那么,中国灾害史研究如何符合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呢?

---

① 苏新留:《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汪汉忠:《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④ 朱浒:《食为民天:清代备荒仓储的政策演变与结构转换》,《史学月刊》2014 年第 4 期。

就目前学界的前沿动向来看,紧跟大数据的时代潮流,建设综合性中国自然灾害历史信息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大力开展量化研究和总体研究,已成为中国灾害史研究未来的首要走向。夏明方指出,随着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建立一个"能够记录灾害发生完整过程和信息,亦即包括从天气、地质等自然变异现象到成灾过程,乃至对于人类社会影响及响应的综合性灾害数据库""以便更全面地揭示灾害成因和环境后果,更好地满足自然变动(如气候变化)、灾害分异、灾害影响与适应、防灾减灾应用等多方面研究的资料需求"。① 这种灾害史数据库,既有别于以往自然科学界偏重于摘取自然信息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于史学界常用的文献汇编方式,而是融史料考订和信息集成为一体的数据平台系统。

这一平台系统的出现,为灾害史的量化研究和总体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有关灾害中自然因素的信息化和标准化,以往自然科学界已经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完全可以在灾害历史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中继续发扬。同时,灾害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应对中的许多信息,如人口和资产损失、灾蠲和赈济力度等,既能够也迫切需要加以量化处理。而据此探讨灾害与国家能力建设、政治变动和经济周期等问题的关联,无疑能够大大改变依靠定性描述的惯性。此外,这种综合了灾害的自然演变信息和社会变迁信息的数据平台系统,也为灾害史的总体研究开辟了道路。具体而言,任何灾害事件的发生和扩散,都是环境、社会与个人同时进入同一个极限情境的时刻,依靠相对完整和连续的信息链,这种极限情境内部的各种复杂关系都可以被发掘出来,也就能充分展现出环境变动、社会变迁的深层与个人生活世界的表层之间的结构性互动。

灾害史研究的另一个未来走向,应该是历史学界更加注重问题意识、深入贯彻新史学方法,进一步克服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目前中国大陆学界灾害史研究最明显的短板,就是问题意识的明确性和敏感性不足。客观而论,国内具有原创意识和观点的成果还是少数,许多研究尚属于对灾害事件的泛泛描摹。相形之下,国外的灾害史研究大都具有鲜明的学术脉络,所论问题也都能与学术范式进行对话。如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对乾隆朝早期救灾行动的研究,其主要反思的问题乃是当时流行于西方学界的"明清社会停滞论"观点和"西方中心论"意识。② 这就不难理解,该书影响远远超出灾害史乃至历史学领域。且具有这种影响的国外灾害史研究,远不止于这一部。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国内学者的灾害史成果,能够在国外学者那里作为学术对话的对象,迄今仍非常少见。

广泛融会各种社会理论的新史学意识,业已成为新时期史学界的潮流,故而在灾害史研究中大力贯彻新史学方法也是应有之义。在这方面,新文化史视角的应用颇具启示意义。这一视角在灾害史领域的较早应用,来自于燕安黛(Andrea Janku)和艾志端。她们关注的中国灾害史的历史书写、社会记忆和不同信仰背景下的文化反应等内容,不仅丰富了灾害史研究的视角,还有助于对历史文献性质的反思和再阐释。③ 国内则在近年来开始出现一些较具水平的研究,如陈侃理关于灾异的政治文化史研究。④ 另外,新文化史还扩大了对于灾害历史文献的认识。例如,一大批以灾荒诗、灾荒小说、灾荒歌谣为代表的文学性历史文献,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得到过灾害史学界的重视,而新文化史的观照下,这类文献显然能够深化对相关时代灾害观及社会意识的变化等问题的理解,从而充分发挥人文学者的特长,有力推动灾害

① 夏明方:《大数据与生态史: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清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② 魏丕信:《18 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该书原版为 1980 年法文版。

③ 燕安黛:《为华北饥荒作证——解读〈襄陵县志〉〈赈务〉卷》,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北京:三联书店 2007 年版。艾志端:《铁泪图:19 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曹曦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④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史研究向人文化、集约型方向的发展。

灾害史研究是历史学科中极具现实关怀和经世致用性质的一个领域,也是研究难度很大的一个领域。其现实性和致用性在于,自然灾害至今仍是人类社会很难预测和控制的巨大威胁,所以历史时期人类对灾害的认识、防灾减灾和救灾经验,始终是值得认真总结的宝贵财富。其研究难度大的原因是,自然灾害包含着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双重变动,所以仅凭自然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某一个学科开展研究,不啻于盲人摸象。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新技术的开发和新思维的出现,中国灾害史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而在深入融合灾害的自然演变信息和社会变迁信息、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框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国灾害历史记录和灾害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特色和优势,完全可以为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The Research Course, Orientation and Trend of Chinese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s

Zhu Hu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sense of modern academics started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 ago. But not until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 was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able to get full development. From the 1950's, thanks to many natural scientists' efforts, the orientation of natural evolution became the main stream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ny historians entered into the study in this field, and consequently the orientation of social change gradually became another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is field. Large numbers of achievement ma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se two orientations constituted the main body of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s. To promot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in this field, we need to strengthen and deep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ircles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 circl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rehensive data base about the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s. On the other hand, historians particularly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overcome the tendency of "non-humanization" in this study, by deepening their problem awareness, and trying to apply the new historical methodology.

Key words: Chinese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s, research orientation, development direction

(责任编辑 管 琴)